

基 調 講 演



転換期における中国の改革－企業・市場・国家－

Jack w. Hou

(カリフォルニア州立大学ロングビーチ校)



2008年12月5日(金)

○司会 それでは、本日の基調講演に移りたいと思います。先ほど高橋所長から説明がありましたように、今年のI C C Sのシンポジウムのテーマは非常に広範囲にわたり、中国の社会、経済、政治のみならず、環境および文化的な要素、それから民族問題と多岐にわたっています。これまでのI C C Sでは、比較的特定のテーマを選び、深く掘り下げるスタイルをとってきました。今年は総括と言いますか、一歩下がり全体像を見渡すようなテーマ設定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したがって、本日は基調講演を、明日は経済、政治、環境の3つのセッションを、明後日は文化セッションと全体討論をおこなうという構成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これまでのI C C Sの様々な研究活動の集大成のような位置付けだと理解しております。

それでは、本日、基調講演においてご講演いただく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をご紹介します。皆さんのお手元にありますシンポジウム予稿集の22 ページをご覧ください。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が報告で使用されるパワーポイント資料が掲載

されております。

最初に、先生の略歴をご紹介します。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は、米国カリフォルニア州立大学ロングビーチ校の経済学部の教授です。また、つい先日まで全米中国経済学会の会長を務めておられました。さらに、カリフォルニア州立大学ロサンゼルス校U C L Aの兼任教授、愛知大学の姉妹校である南開大学の兼任教授等々を務めておられました。また、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は米国イェール大学でPh. Dを取得されました。アメリカの主要大学、中国の大学でも多くの兼任教授等を務めておられます。もともとのご出身は台湾ですが、アメリカ、アジアと世界を跨いで活躍されております。今回は大変お忙しいスケジュールのなかで、本日のシンポジウムのために無理をお願いして来日いただきました。本日の講演のテーマは「転換期における中国の改革—企業・市場・国家—」というテーマでご講演いただきます。それでは、皆さん、拍手をもってお迎えしましょう。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転換期における中国の改革—企業・市場・国家—」 Jack w. Hou (カリフォルニア州立大学ロングビーチ校)

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李老师刚才好像对我过度夸张的介绍。我非常荣幸有机会。我从来没有到过名古屋，但是闻名已久，从小就在历史地理当中听到过。所以当高桥老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几乎只花了两秒钟就决定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多代表的会议，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演讲，应该是第一次正式的用中文演讲。我从1981年到美国读书就一直待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用中文做过学术演讲。如果我自己选择的话，宁可用英文演讲，因为有很多中文的词一下子换不过来，讲英文就方便多了。另外也是很新鲜的第一次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不是针对纯经济学的研讨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挑战。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的演讲我想把它讲的比较广泛，不要局限于纯经济学，不要都是数学模型，不要使各位都觉得乏味，我自己肯定也会打瞌睡。

我的题目如果各位看议程里面有三个完全不同的题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讨论经济转型之间，市场、企业家跟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后来我在准备PowerPoint的时候，我又把它改成了《纵观中国经济改革》。最后我把大纲送过来的时候，我又把它转换成了这次大会的主题。但是基本上内容是一直没有变的。首先我要向做同步翻译的几位同事道歉，因为我实在太忙，所以整个稿子没有事先准备好。我了解他们的压力。两年前，我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研究论坛讨论中国农村医疗的问题，全部是国内的学者专家，全部使用中文，但是有几个西方学者想听，我是临时被迫做同步翻译。那一个半小时是我这辈子压力最大的一个半小时，我觉得那一个半小时我大概老了两三岁，所以我非常了解，向他们道歉！

针对高桥老师刚才讲的几个问题，我深有同

感。譬如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当然占主导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一直到96、98年以前，我所有的文章里面都强调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可以暂缓一些。可是到了96、98年开始我的文章的论调就改了，我认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如果其他不能够配套跟上的话，会有危机的出现。因为我们做老师的，讲课很重要的就是要用一种让学生能马上抓到的方法讲。比如说，人上半身可以向前倾，你可以往前倾一个阶段，但是如果你的脚不跟上的话，你就会跌倒。所以中国早期的经济改革能往前倾，但是后来如果你脚不跟进的话，问题就会出现。当然，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要讨论创造和谐社会，问题就是出在社会已经不和谐。如果中国社会和谐的话，那么这个议题就不用讨论了。所以这就是刚才高桥老师讲的三个大方针，经济的改革做到了，但是政治、社会的改革还没有配套跟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高桥老师刚才讲到一点我也很同意，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她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其中有一些摇摆不定，是无可置疑的。去年在法国第六届国际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我有幸在闭幕式做演讲的时候，我就讲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方面的大国，可是他还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大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必须负起相当的责任，我认为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定位有所认识。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也不够。今年六月在德国Forum 2008上面，我被邀请讲中国粮食安全問題，那个时候我说欧美国家过度快速的批评中国，而非常不愿意赞扬中国，我觉得这一点西方国家也要作检讨。如果对中国只有一味的批评，而对于他做好的不加称赞，那么如何引导中国慢慢的转换成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记得那时候前欧盟能源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说我讲的那句话他会永远记得，他在开会时也会经常提醒欧洲的一些高级官员不能一味的指责。我在美国也感受到，美国有很多地方对中国又羡慕又怕，然后变得很快的就会批评中国，但又非常吝啬赞扬中国。这一点我觉得不光是美国的错误，其它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有这样一个认识。这是刚才我听高桥老师演讲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我开始是想以林毅夫的话为演讲的起点。林毅夫，我认为是在中国最有名、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毅夫现在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总经济师，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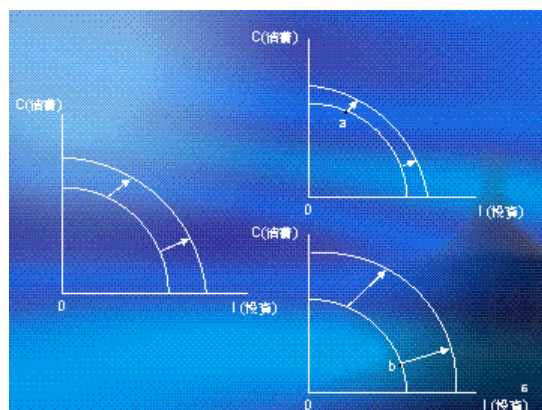
是在他当世行副行长之前讲的。两年前，他在来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可以持续25年的7%的经济增长。我们先停下来回头看一下。80年代的时候中国曾经提出一个构想，中国希望在2000年的时候能够达到1980年真实GDP的4倍，那个其实就是7%的真实成长为国家目标。

我在美国讲宏观经济的时候，跟美国学生讲中国希望在2000年达到1980年真实GDP的4倍。我就问学生：“你们认为中国办到了没有？”美国学生根本就搞不清状况。我就说，严格的讲中国没有做到。为什么？因为中国在1995年，提早了5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准，这个是转换成9%的真实增长。尤其是1995年以后，中国的真实成长速度更快，平均大概在10%—11%，所以这三十年（1978—现在），中国的平均真实成长其是在10%左右，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年前毅夫来UCLA演讲的时候，提出中国可以持续25年的7%真实成长。那个时候在UCLA没有人相信。像我的几个同事Harberger、Edwards他们就问这个经济增长从哪里来？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由这个地方入手，中国经济怎么增长？在座的各位专家其实不用我讲，你们大家或许大部分的人都会认同毅夫所讲的话，中国应该可以做到。但是我先从传统的教科书讲，传统的教科书是纯西方的观点。传统教科书讨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有两个，第一个是资源数量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跟资本累积的增加、土地的增加；第二个来源是资源质量的增加。各位在这边教导学生，这边的各位学生你们在这边受教育都是在提高人力资本，这个就是资源质量的提升。当然中国的教育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在我们学校里面，那些从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国内到我们那里来读研究院的学生，我们所有的同事都异口同声的承认，他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尤其是数学比美国学生要强很多。当然也有缺点。我们的教育比较缺乏启发式，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会做、我们会算，但是缺少创新。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教我微观经济的老师是一个德国人，他把作业发下来，我在想他是不是发错了作业，这个作业好像跟上课没关系，不知道如何着手。在美国好多研究所，上课老师讲的是一套，你要去读通、延伸，然后应用到作业上面。这个作业跟上课讲的似乎没关系，因为他要你应用。然后我就不知该如何着手，但是跟我同

伴的那个美国同学，他非常喜欢打球，经常回来衣服一脱掉在那边擦汗，“我们可以试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有数学能力，你告诉我方向，我可以做出来。他看的出方向，但是没有数学底子，他不会做。所以我们这两个教育系统像“天残地缺”，如果能够综合就完美了。我们教育者应该思考如何把这两种结合起来，让学生有这个技术、能力，但是更有思考、创新，这就是我个人在美国教学多年的一个感想。

言归正传，从资源数量来讲，其实中国的资源在很多地方是相当有限的。我今年在德国演讲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讲中国的粮食保障问题，因为这个很有意思。今年3月小麦价格涨的飞快上涨，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提醒说，如果中国突然需要进口5%的小麦，那3月会怎么样？所以幸亏中国农业保障做得好。当然我也说中国用世界百分之七的可耕地，养活百分之二十几的人口，这个我不是专家，是看统计数字讲的。所以如果讲的不对，请下面专家多多包涵。我是看统计学这样讲的。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其实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贡献。世界对中国的成就需要有所认同。讲到资源数量，中国很多的钢铁是从巴西进口的，中国到巴西签了很多长期的矿物方面的合约。中国在非洲大量的投资开矿，这都是把资源的取得不只局限于自己国内，而是把资源的取得扩展到世界各方面。这是中国传统方面的，不能够只局限于国内，对于国外能够掌控的也是一个成长的方法。从一个图形的观点，我向各位保证这是唯一的图形。根本不是数学，我不打算用数学。左边的第一个图，里面的一个弧度是我们所谓的生产可能线，就是以现有的资源，现有的生产力、科技所能够最高达到的。这个是原来的生长可能线，资源取得可能的增加，资源品质的增加，使生产线外推，这个就是经济成长。这边两个可能，在A点，这个国家目前所选择的是以消费为主，而相对的投资有限，消费很大。投资是资本累积的重要管道，如果投资少，资本累积就少，那经济增长就有限。而相对下面这个国家，国内消费相对的低，可是投资方面非常的大，所以其经济增长就相对的快。有了这个基本观念以后，我们可以看出，譬如说，国内投资现在不光是政府的，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省级地方政府大力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就趋向于B点。更何况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是开发中国家，FDI 国外投资最大的受益国，

2003年的时候甚至是世界第一大，超过了美国，但是后来美国又反弹了。所以在中国投资方面是很重要的。



刚才谈到了资源数量、资源质量。但那是从一个已经开发的国家观点看的，中国不止如此。中国基本上（如果从刚刚讲的话）不光是这个问题，中国现在目前是在生产可能线的里边，光是从里边走到生产线上，就可以成长相当久。而欧美国家包括日本已经在生产可能线上，只有资源数量的增加才能造成成长。而中国尚有未使用的资源，加上使用效率的提高，就是一个很大的增长数量。不要忘记，中国有很多隐藏性的失业，哪有五十岁就退休的？像我的堂弟，在安徽老家，已经下岗八、九年了。安徽是相当穷的，从南京到安徽，我就可以感觉到像是两个国家。所以这方面就是资源还没有使用，以及使用效率的提升，这就可以持续成长相当久的一段时间。

空间性的经济发展。刚才提到，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发展主要是东部沿海。虽然这几年开始讨论西部大开发，但中国的中部、东北、西南，还有很大的空间性的经济发展潜力，还没有做到。这个是很多洋人他们所不了解的。这又是一个很大、很长的经济发展来源。

内需的提升。刚才高桥教授已经提到，中国国内消费已经成长了很多。可是我们也知道国内消费水平仍然很低，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持续经济成长的来源。当然这次中国受到美国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冲击，之所以比一般人想象的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过度的依赖出口，而不是内需。这次世界经济的问题起源于美国，可是相对来讲，美国经济所受到的打击比欧盟及其他很多国家还要轻。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内需求。我昨天跟吴教授在从机场来的时候讨论，美国经济什么时候会复

苏？我这个人一向比较乐观，心宽体胖，所以很多事情想的比较乐观。我认为快的话，美国明年八、九月份可能就会复苏，甚至更快都有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很重要是个人消费。随着对于新总统的期盼，如果奥巴马能够做得好，给大家合理的认为有这个期盼，人民就会开始消费。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反弹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好。我可能是比较乐观。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来源就是**制度的相应改革**，我们这次大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在讨论这种制度的改革。后面也会再大致的做一个讨论。制度的改革，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今年9月在台湾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这里再做一个讨论。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经济改革的关键阶段，制度相应的改革是越来越重要。很多比较简单的改革都已经完成了，开始要做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决定。在我离开这个之前，我举一个例子。或许各位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我是在美国的一个电视的节目上看到。我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洋人这个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美国有一个节目，报道中国的一个国有企业生产洗衣机，他们接到很多抱怨，乡下农民在抱怨“这个机器不耐用，一直坏。”他们就派了工程师到农村去实地访问，看问题出在哪儿。结果他们发现农民在用洗衣机洗马铃薯（土豆）。那洗衣机当然会坏。可是那位工程师灵机一动，“有这个市场呀”。于是他们回去设计了一个洗马铃薯（土豆）的小机器。这个是洋人想都不会想到的。这个也是GDP。这个还是经常有折旧，需要换的，可持续的GDP来源。这个是教科书上都不会提的。我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到制度改革的问题，中国现在容易的都已经做了。

去年我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的。我因为是下任会长，所以在闭幕式的时候要发表一个演讲，讨论一下今年（就是我为会长的时候）要针对的主题，我提出来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其实代表了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从深圳到浦东、从浦东到滨海新区，沿海一线完成了。从这个观点来讲是一个新阶段。另外一个观点，改革三十年，回顾、检讨、展望。这个隐含的就是在问现在中国属于什么阶段，我们还处在摸着石子过河的阶段吗？我们还处在黑猫、白猫都要的阶段吗？我们还处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

阶段吗？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是否认的。从某个观点来讲，中国过河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过河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如何消除黑猫，只要白猫，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让大多数的人都富起来。去年我在长沙讲这些被人家批判，说我在反对邓小平。有人在公开的批判我，说我在反对邓小平思想。我就不相信，如果现在邓小平同志还活着，他会讲黑猫、白猫都要？我就不相信他还会讲我们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他绝对不会这么讲。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现在必须要了解处于什么阶段。所以今年演讲的时候，我就赶快改成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在江泽民同志的掌控之下、在胡锦涛同志的……。因为在美国待久了，尤其是在台湾出生的，很多这种政治上的拿捏，我不是很道地。所以经过那次教训，讲话就比较小心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去年那个闭幕式上讲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是我们的主题。那个时候我给我们的会员，包括国内的很多学者下一个挑战：明年也就是今年在天津开会的时候，希望我们不是在讨论中国的问题在何处，而是在讨论中国如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相当的创新，我们办了六个政策论坛，六个圆桌，这边大致列了一下这六个圆桌的题目。每个圆桌我们请4—6个专家，原则上是2—3个不同派系的看法的。如果6个人都是同一个派系，那就不是一个论坛。所以我们就刻意的找意见不一样的学者专家来做一个辩论、讨论，看看能不能用辩证的方法找出解决之道。当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没有想象中的理想。有一两个做的不错，有的还是变成了半学术性的意见发表，而不是一个论坛。因为我原来的构想是希望这六个论坛能够得出一些好的结论、建议，汇总一下送给国内政府的相关机关，我们不敢说是政策的建言，只是提供一些可以考量的做法。我希望下任的会长王洪能够继续这个问题，像土地使用权与住屋市场，我们中间很关心的是小产权问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个，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持续发展与社会保障是怎么能够必须并存的。当然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问题所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长期以来过度的依赖出口，基本是用贸易换取经济成长的一种策略。我们现在这一次讨论就是说，这个策略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就算对的话，到什么程度，不能够过。因为从某一个观点来讲，我们平心静气讲，欧美国家有没有把污染工业出口到中国来？有！我

第一次到天津、北京的时候，中午十二点可以抬头直接看太阳，有朋友说这是雾，怎么天天都是雾？我1月来、3月来、6月来，怎么每个月都是雾？这个就是空气污染。所以平衡在哪里？从某一个观点来讲就是黑猫、白猫问题。这也是黑猫、白猫问题之一。被遗忘的一群：三农。这次会议就要讨论三农问题，这个很重要。我写过几篇文章，我个人对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意见。刚刚李老师乃至高老师一直说我是研究中国的所谓世界专家，没这回事。我只敢说我是对中国关心的，连学者都不敢自称，对中国关心有兴趣的一个学生。所以我写过很多文章，从英文的观点来讲，I am thinking outside of the box。我是在框架外面想，为什么在框架外面想？因为我人不在框架里边，我不是真正研究中国出身的。我是研究劳动经济，研究国家经济的，对经济史有兴趣的一名学者。毕业了以后，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关心才开始研究中国，至于中国的很多细节我自己根本就不懂，所以我是在框架外看。从好听的观点来讲，我是在一个创新的框架外看。从比较难听的观点来讲，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胡扯。所以这个看你是从什么观念来讲。看这瓶水是半满还是半空，看你从什么观点去看。

我相当高兴的是我们讨论第五个主题：明日的工人。这个当然讨论到教育、人力资本，也是人口老化的问题。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可能是比较早的提出是不是要重新考量“一胎化”。因为当劳动人数不够的时候，不是工厂加工就能够再生产出两百万工人，两百万工人得花十八年才能生产出来。不能等到需要的时候再开始讨论，现在是到了该讨论的时候了。所以我希望与会的学者，大家有什么意见互相讨论一下。我不敢讲我们现在该放弃一胎化，我绝对不敢讲这个，我只是说这个东西是需要考量的一件事。因为等到我们发现劳动力不够的时候，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生产出两百万、三百万、一千万劳动力。必须要提先考虑这个问题。我是台湾出身，所以对于台海两岸的问题也是相当关心。我们是4月开的会，那时台湾已经有所改变，所以也是不错。我们请来的主题演讲者之一，就是台湾前经建会执委薛老师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我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8北美会议上，我们把议题针对在医疗、环保、贫富差距，当然这也是今年ICCS这次会议上面所要讨论的问题之

一。我主要是想说，毅夫所讲的中国可以再持续25年的7%真实成长，我觉得是相当可能的。但这是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下，就是政治跟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高老师所谈到的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改革的配套。当然至少我个人认为中国政治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出现危机的，社会问题上是不是能看到危机有非常多的观点。事实上早在今年4、5月份就已经出现非常多的问题了。当《劳动合同法》一通过，有很多小型的外资企业都撤了，连夜之间就关门不见了。这还是在整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之前，现在当然从某个观点来讲，几个负面的作用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时机不是很好，中国有几个城市不是有很多示威，目前是局限于地方政府。他们很快的把拖欠的工资归还，给以安抚。只要中央政府站在一边，不要过度反应干预，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可以控制，控制在局限于地方。中央政府绝对不能够过度干预，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稍微转换一下方向，比较离开中国经济成长、和谐社会这些问题。讨论一个比较趋向于经济史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主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刚刚讲过三十年来10%的真实成长。如果没有事实证明在这里，三十年前讲这个话我就不相信欧美的经济学家有几个人会相信，不可能！现在他们相信，为什么？因为已经做到了，这是事实。而相对的如果你看俄国或者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他们所遇到的经济困难。我们经常就会问，他们是否可以学习中国？这个就是我讲的，稍微转换一下讨论的议题。如果我们大家看所发生的事实，俄国是使用激进，英文可以叫“Big Bang”，或者叫“休克”这种方法。而中国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摸着石子过河”，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写照，一个小心谨慎的做法。在演讲上面都是把事情过度的简单化了。如果俄国缓进的话，他是否可以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俄国缓进的话，他是否可以避免经济方面的负面后果？我个人认为是“没办法”。当然从某一个观点来讲，这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这就好像问如果苏格拉底当初在Delium战役的时候死了，西方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时希腊联盟跟波斯长达快30年的战役中，Delium战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雅典惨败，雅典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生还逃出来，

中间包括了苏格拉底。如果苏格拉底死了，那西方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子？换一个观点来讲，当初孔子周游列国被人家误认为是阳货，困于垓下差点没饿死，如果孔子饿死在那里呢？那咱们中国文化，乃至日本文化会演变成什么？这其实上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可是经常会引起大家的讨论。所以我就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出发点。

凡是受过西方新古典学派教育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容易被两件事情误导。第一个是认为市场永远存在，因为从数学的模型看，供需、市场结构是存在的。第二个被误导的是所有的调整是瞬间可以转变的，从数学的观点来讲，变数一变，马上可以导出新的价格，新的产量应该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试试的话，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从中国1978年经济改革乃至俄国90年代中期开始的时候，市场根本不存在。市场不存在的话，他绝对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创造出来的。所以邓小平“摸着石子”缓进，一步一步的，是让市场建立起来很重要的一个机制。而相对的，俄国的激进没有给市场发展的机会，当然这个是把事情过度的简化了。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就算市场机能存在，做一个重大的调整、重大的改革的时候，最快也要需要几年时间，一代、两代，甚至十几二十年才能够真正的落实。像各位在座的我这个年龄的或者比我更年长的学者们，你们对于那个时候公社的生活就算没有经历过，也从父母那听过。可是现在在读本科生的学生，你跟他讲当初北大荒，当初下放劳改的事情，他们觉得你是在讲神话。因为他们这一代，这一方面的改革已经改了，讲这些他们不太了解，会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我们在台湾有一门必修课《大陆问题研究》，里面当然会讨论这个，我也知道讨论是负面比较夸张的，台湾是有政治目的。所以我读他的时候，也是稍微采取一个相对保留的态度，可是我们自己也知道那个时候文革所经历的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一些年长的学者，心里头会有一个感慨。所以这个转变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调整的。比如说美国，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如果对我讲美国那些对穷人的福利要改革，我认为已经根深蒂固，变成美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很可能是改不掉的。但是美国改了，花了快10年时间。像美国现在穷人享受社会福利只有五年，过去可以几代的。“福利妈妈”生下的孩子继续受福利，可以世代。现在终身只能享受五年的福利救济，这是克

林顿当总统的时候颁布的法律，现在慢慢已经变成美国接受的，连民主党也接受了。当然这个很有意思，如果老布什当初竞选连任成功，我就不信这个福利改革能够推行下去。因为民主党会极力的反对，可克林顿是民主党的，他主导民主党，其反对声浪相对的就降低。共和党赞成，所以就通过了。就好像当初美国跟中国建交，那时候是尼克松主导的。如果换一个共和党的总统，那么高华德（极端右派）可能会杀到白宫去，把总统打一顿。可是尼克松跟他是同党，也是共和党，他再不高兴也没办法。就像美国有一句话“He is a S. O. B. , but he is my S. O. B. .”（“他是一个混账，可是他是我的混账”）。就没办法。

言归正传，刚刚讨论到受新古典学派数学模型熏陶下的经济学家总认为市场机能永远存在、所有的调整瞬间可以完成。可是仔细想一下，这根本是与事实违背的。我在好多演讲里面尤其是在美国、欧洲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到从大自然的眼光看，他一向是不喜欢大的突变。我经常开玩笑，这个在美国大家都听得懂，这儿我就不太清楚了。各位知道有一种突变是白色的老虎，当初源自于印度。现在世界上白色老虎最大的集中地是在哪里？拉斯维加斯。因为拉斯维加斯有两个魔术师，他们收养了一批，自己在那边繁殖。如果不是这两个魔术师的话，白老虎在大自然中早就绝种了。各位想想看，他是白色，没有保护色，猎物很远就能看到他。他没有保护色，是白色，猎人要杀他也容易，他是白色、稀有，猎人更要杀他。如果在大自然的话，大自然早就让他绝种了。所以大自然一向不喜欢大的突变，当然从某一个观点来讲，所谓的演化是一群小突变的结合。所以我讲的是小突变大自然接受，大突变大自然是淘汰的。从某一个观点来讲，当初列宁的革命可以视为一种突变，俄国90年代激进的改革其实也是一种大突变，所以从自然演化的观点来讲，自然界对这个一向不是很容易接受。我在西方演讲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开场白，来讨论中国跟俄国的一个比较。中国跟俄国不仅仅是激进与缓进的问题，另外一个常常被大家所提到的是改革顺序的问题。这个问题，Jeffrey Sachs和我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一个资深会员胡永泰，他们的文章认为是一个出发点(Endowment)的问题。因为在俄国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85%的劳动力就业于非农业部门，因为已经相当的工业化了。

而在78年,中国非农业人口只有18%,根据 Jeffrey Sachs 跟胡永泰的数据,只有18%。所以中国在农业改革方面有相当大的可以运作的空间,而相对的俄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已经过度工业化,农业可以做的有限。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简单,从某一个观点来说,中国没有那么聪明,有一点误打误撞,变成了从经济学眼光来讲,正确的改革的一个顺序。我的一个老师费景汉跟他的同事 Gus Ranis,提出的 Fei-Ranis 二元化经济发展理论,就提到在经济发展中农业扮演的是一个历史性的角色,粮食生产必须提升到某一个程度,让粮食剩余足以养活非农业人口的时候才能够开始讨论工业化,如果生产出来的粮食光养农民都不够的话,工业化不用谈。必须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能够释放出农民,能够养活他们不必种田也可以吃的饱。工业革命就是这样,这些农民进入城市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劳动力。农民要足够的富有,能够购买很多工业产品,这也是他的历史责任之一,等等。他要足够的富有,能够提供一些储蓄,这是过度简化费老师跟 Ranis 二元化经济的一个理念,所以农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中国当初的包产到户这样一系列下来,让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粮食比过去提高了,用的劳动力比过去少,释放出农民到城市,很合乎他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当然相对的俄国,只有15%是在农业,这方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可是我认为中国根本不是读了费老师的理论而有这个策略。我写过一篇文章,跟我合写的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现在在匹兹堡大学。我们的文章讨论,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有两次大的粮荒。文革第一年生产还好,可是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很多生产得停下来学习,很多工作停顿,化肥、煤没办法运,为什么没办法运?红卫兵大串联。火车结构本来就不是很健全,几百万的红卫兵要到北京大串联使很多的运输都停顿。计划经济之下,很多重要的生产资源没办法输送,所以到文革的第二年,粮食生产不够。这个其实是造成林彪、周恩来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林彪认为有些资源应该放在国防,防止苏联。周恩来比较务实,认为需要解决粮食问题。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林彪是已经定为接班人,可是毛主席后来是站在周恩来这边。所以革了几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是意图夺权吗?后来据说飞机出问题坠机的吗?据说,我朋友说很有意思,那飞机旁边有一个大洞,那视为机器故障,我们这个就不提了。中央

为了感谢那个时候的军区司令跟地方省长们没有挺林彪,把部分的自主权下放。而各位想想,如果你是省长,你是地方的重要干部,你有这个权的话,你会把资源放在农民身上还是放在都市身上?显而易见是放在都市身上,造成了第二次的粮荒。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毛主席乃至中国才采取了一个相当大的政策改变。没有多久就开始乒乓外交,对美国示好。乒乓外交访问了几个地方,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全部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国。70年代中期,中国跟日本签订了十年长期贸易条约,中国是用石油换日本的化肥科技。日本为什么接受中国的石油?中国石油的品质没有阿拉伯的品质好,可是日本刚刚吃过 OPEC 的大亏,要分散石油的来源。70年代末期,中国进口了整个工厂,不是进口机器而是整个工厂买下来拆掉,一个船一个船的运到中国再组装起来,然后欧美国家工厂的科技人员也是买了半年过来。其中绝大部分的工厂全部是 ammonia(氨),60%是 ammonia 工厂。ammonia 是生产化肥的最基本的材料,所以这一连串的迹象显示都是为了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包含安徽包产到户小型的试验,走了几年突然回头一看,好像有一些成果,78年才开始正式的推行。是大致的这样一个思路。78、79年那个时候通过的决议,题目其实跟当初刘少奇、邓小平说的那个改革是同样的,内容不太一样,可是整个标题是同样的一个标题,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可能是比较幸运。

但是俄国的劣势不止于此。中国从1948年解放到1956年,基本上私营企业是存在的,虽然相对的慢慢在消解,可是基本上是公私并存的。56年以后公社建立,私有企业才逐渐不见的。然后三面红旗、大跃进之后造成的三年大饥荒的时候,邓小平策略性的转换,有些类似于78、79年经改的一些措施,然后从文革到73、74、75、76,不管是用哪一个年度看,中国基本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真正的讲严格说来没有二十年。而相对的一个简单的观点看,俄国1917年革命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八十年的计划经济。所以中国当初的那些企业家,只经过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这些企业仍然还存在。俄国的企业家经过八十年都已经老死了。所以俄国剩下的有企业家精神的是一些贪官污吏和黑社会,基本上是这两类人有企业家精神。我看了一个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他们估算,俄国

70%的金融业直接或间接跟黑社会有关，比较正统的传统企业家已经死了，只剩这些比较有经验的。今年8月我代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参加欧洲的比较经济学会年会时，跟他们讨论为什么俄国莫斯科是世界上百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地方。莫斯科非常贵，我住的一个三颗星的旅馆，两颗星的服务，一个晚上180美金，那还是大会打折了以后。有的房间需要用公共厕所，还要一个晚上180块。他的物价之高吓死我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富有的人？他说这些百万富翁基本上是过去在政府部门管工业的官员。比如说一个炼钢厂经营不善，要改成私有化，这个政府官员用不到一年的营业额的钱买下这个工厂。不要忘记这个工厂经营不善，所以他所谓的不到一年的营业额其实只是他生产潜力的10%。用不到10%的钱贷款买来，一年之内就还清，这就是俄国百万富翁的来源。这是在俄国的一些同事讲解给我的。

言归正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废除了俄国的农奴，解放了三分之一的俄国人口。他又颁布农民（解放出来的农奴）可以向地主买土地，并没有很落实，基本上只有25%达到了。更糟的是这25%里面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公社的架构之下，作为土地的使用生产，不是个人决定的，是整个村子决定的，基本上是个公社。真正私人决定的土地，只占8.48%。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俄国的农民基本上没有企业家精神。我看了一个报导，如果你过黑龙江到西伯利亚，可以看到有很多大的农田做的很好，那不是俄国人在做，那是咱们中国人在做。中国的农民有企业家精神。为什么？中国从周朝以来基本上是一个井田制度，土地是国有的。拿唐朝来讲，男人16岁及冠，政府给100亩土地，女人及笄14岁，60亩土地。我在西方讲课的时候，我就讲咱们中国多先进，虽然女人拿的还是比男人少，可是不要忘了那个时候在欧洲女人还是财产，女人哪有自主权？哪里能够领土地？根本就是男人的财产。那咱们中国，女人还有60亩地。多先进！在国外讲学的时候，我刻意的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有多先进。不仅是现在，先进了几千年。一直到唐朝都是这样，可是后来中国人口跟土地已经无法维持这个传统。宋朝开始，王安石变法，土地开始私有。在井田制度之下，缴税不是交钱，缴税是交货，农民是交稻子，政府官员的薪水也就是稻子。这个政府官员是二千石，一年的薪水就是二千石稻

子。所以今天跟爱知大学的一些老师谈得时候，他们说日本也是这个样子。当然了，因为日本基本上是跟唐朝学习挂钩的。如果他们跟宋朝学习挂钩的话，可能日本的情形也就不一样了。到了宋朝的时候中国缴税，已经开始交钱。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迪斯奈的一个卡通《木兰》？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卡通里面政府官员到村子拿一个状子叫名字？缴税。因为花家是兵户，平时政府给他们粮食等于给他们薪水，打仗他们要去交税。所以花木兰从军的时候，她是带着自己的马、自己的盔甲、自己的兵器，她是去交税。这个就是井田制度下的一个制度。中国从宋朝开始废除了这个制度，开始交现金。这个造成过去交税都是交稻子的，北方稻米多得是。这些官员拿到了这些米，两千石，天天二十四小时吃也吃不完两千石，所以拿到市场上卖。可是到了宋朝不再交这个税了，北方没有稻子，所以北方人需要吃稻子的时候，必须由长程的谷商从北方一直到江南买米。他身上如果带了三百两银子，又重又危险，于是钱庄、银票出现了。农民现在不是交稻子，所以他不必要种稻子。农民从宋朝开始就可以用土地的比较利益来生产对他来讲最有利润的农作物。中国从宋代一千年的历史。这些长程谷商到江南买了稻米，运回去也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运输业、大运河，沿途的吃、住、商旅，商业的兴起，这个是中国宋朝开始的。一千年！跟前面讲的俄国亚历山大沙皇二世才开始改革是差太多的。所以中国当初包产到户很多发展的很快。俄国就算他想学也没有这个软件。

另外还有一点。我对经济史是相当感兴趣的。中国宋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军事的观点，宋朝大概是中国最弱的王朝，可是他的重要性远比大家想象的大。刚刚提到的井田制度的废除，让中国农民建立了一个企业家的精神。北宋亡了之后，很多士家南迁，过去很多读书人是上流社会的，地主就是光读书、收地租。可是北宋亡了，他们南迁的时候钱和金银珠宝可以带着，可是土地不能带。永续的地租没有了，带的金银财宝是有限的，是可能会用完的，所以有部分的人开始从商。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岳麓书院的出现，也使儒家思想慢慢的进入民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商人好多还有很多的座右铭？“苟日新、日日新”等等。乃至于日本的大株式会社还是定期的请汉学家讲解儒家思想

给他们的高级部门主管。就是因为儒家思想南宋开始深入民间，而不再是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一个专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从宋朝开始尤其是南宋，中国海洋业开始发达，我在台湾甚至美国看到有一批考古学家认为，发现美洲可能是中国人，当然维津人是有可能。但是因为在加州沿海发现很多庞大的圆石头，中间是一个洞，非常庞大，不知道干什么。早期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印第安人对大自然崇拜的一种宗教用品，可是中国宋代远洋的船的锚就是这个圆的、中空的大石头，但在加州沿海发现这个，所以有一批美国的考古学家就在问这个会不会是中国宋朝的船过来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是把它提出来作为大家的一个考量。当然宋朝以后乃至到现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差别，中国在海外的华人人数很大，而且经济底子都不错。不见得比印度人多，可是我们华侨的生活水准比印度人高。更何况把钱送回老家的中国人比印度人多很多。各位想一下，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外资进来最大的区是哪里？香港。然后台湾第二或第三，那个时候算是海外华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写照。因为我是台湾出生，所以我爱说台湾其实是最大的。因为香港的很多港资其实是国有企业出去转一圈再回来，以港资的身份回来能够拿到优惠。所以很多港资不是真正的港资，是国有企业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台湾在国内的投资其实比统计数字低，因为台湾到中国投资需要政府同意，法律规定需要政府同意，所以很多大的企业，包括王永庆在内，他在国内有一些投资，不是用王永庆在台湾的公司名义出去，而是用王永庆在美国休斯顿的分公司，用那个名义进去的，其实基本上是台资，可是不是以台资的身份进去的。这个大致提一下，因为我写过几篇文章讨论台商在中国投资的事情，这个是大致拿来借用一下。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古埃及，不管是希腊的联盟，不管是泛罗马帝国乃至到比较近代的重商主义之下的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国。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重商主义体现在政治上的就是殖民地主义，这些都是政府干预的。所以政府在经济中始终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谓政府应该退出，让市场主导，这是非常短暂、非常近的一些思想。我长期认为，我刚才也讲过，一直到96年乃至到98年我始终认为中国应该是经济改革为主，

政治、社会可以暂时延后。因为我认为在经济改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想先跑，你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像是交通警察一样：“停！”、“走！”、“停！”、“走！”。或者是一个大交响乐团，每一个音乐家都在演奏他的曲子就乱了，要有一个指挥家，这就是政府扮的角色。中国基本上有这种形态。所以我认为在经济改革初期，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从某一个观点来讲，就好像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她不一定需要到妇产科医生那里去做检查。妇女在生产小孩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有妇产科医生在场。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要有小儿科医生照顾。可是如果有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的长期健康比较有利。一个国家的诞生，经济改革有如医生般的重要。没有医生，他可能还是可以生的，可是他的失败率可能比较高，就算成功的话，他的组织可能较差。在中国改革的时候，中央政府乃至到省级政府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我们再退一步看，不再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而看现在的问题，从一个市场经济学者一辈子受新古典学派市场经济学教育的一个经济学者的观点，我们一向认为应该让市场机能调节。但是即使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前，我个人的意见始终认为，小的乃至到中型的问题政府不要干预，让市场消化让市场解决，可是真正大问题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还是再一次的依靠国家。感冒咳嗽到药房买咳嗽药、买个感冒药吃吃就没事了。你心脏病发作，发现你有癌症，我就不信到药房去买个药吃吃就好。所以你那个时候的观点，医生是不是就跟神一样？我想大概现在美国的各大企业都会把目光看向美国联邦政府。这个不仅对中国经济改革，乃至到现代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影响深远的一个问题。

制度改革与传输成本。前面提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差不多已经做完了。我刚才不是客套的说我不是中国专家，我真的不是，我是对中国很有兴趣，对中国非常关心的一个学者。或许不应该用体制，应该用制度。因为有人提醒我，体制改革，尤其在中央政府的观点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词语。严格讲起来，我想讲制度改革，体制改革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制度跟体制有一点敏感，我当初犯过这个错误，被国内的朋友警告过。我今年写了一篇文章，应该年底会在《亚太管理理论丛》上发表，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传输成本”。我们在经济学上

最早期的生产成本，严格讲起来是 transformation cost。是如何把塑胶、水转换成一瓶水，把粗的资源转换成一瓶水。这个生产成本叫做 transformation 成本，后来又加了运输成本，transportation cost，后来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老师 Coase 提出了 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我提出了一个概念是传输成本，为了要保持传统，所以英文用了 transmission cost，Transformation transportation transaction，一体相承。我想讨论的是制度改革，这是使生产成本改变很重要的一个因子。这个跟其他前面提到的成本不一样，前面提到的成本都是正的，也就是说都是正的成本。传输成本有可能是负的。譬如说最

问题，这些改革都会有相当的传输成本好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研究讨论的重要方向之一。

我最后要讨论的是市场经济的缺陷。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可是基本上市场经济绝对比计划经济有效率，这个是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而我们从新古典学派看，自由经济、自由竞争是最有效率的，这个也是大家没有争议的。至于说，市场机能是不是健全等等，前面我已经提过了，这个我不打算讨论了。我这边提出的就是讲，中国得朝西方自由经济思想这个方向搞。我刚才讲的制度改革，也是一步一步的政府要慢慢退出经济干预，把制度建立好。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家认为，政府应该像一个安全守夜员一样，保护制度的安全、财产权，确保契约合同的执行，而不再是干预，这个是自由经济的一个基本概念。我这边提到的，《史记》上有记载：“网疏而民富”。各位如果去读《史记》，司马迁所描述的汉朝的富裕，他讲汉朝稻谷堆积如山，任他风吹雨打、腐烂。不要忘了，这个稻子是什么？是税收。政府税收多到富裕的没有地方放，放在外面让他烂。政府有钱，社会富裕。司马迁写汉朝初年如果到乡下，可以看到成群的马。在城市里边每一家门口都有绑马的木桩，这个是代表什么？富有！因为汉朝初年马贵。汉高祖刘邦打仗是骑牛的，打仗用不起马。所以司马迁写描述汉朝的富裕。就好像说名古屋每一家车库门口都停着一辆 Cadillac，一辆 Lexus，他是在描述富裕。他要讨论一下政府那个时候的做法是什么，结论是“网疏而民富”。“网”，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政府的管理。“网疏”，就是政府的管理松散，

明显最简单的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同书、同文、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个是制度改革，使生产成本大幅下降，这个就是我讲的负的传输成本。制度的改革可以使生产成本下降，这是我提出的主要概念，当然跟中国经济史有一定关系。也跟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有关系，制度传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成分。现在美国对于很多企业大量的解救，不是免费的给，而等于政府是大股东，当然政府的很多管制是会增加。这个管制，从某一个观点来讲，是进行政策调整，使成本上升，但是他降低了风险，降低风险也可以视为一种负的传输成本。所以现在中国面临很多刻不容缓的制度改革，譬如说健康保险的问题，老人退休的

没有太多的干预，所以人民富裕。这个是非常好的自由经济的例子，我在美国讲经济史的时候，我那个图形里面就会有一个问亚当·斯密的思想源自于何处？中间就有一个是中国，然后用虚线引过来，我不敢用实线，因为他没说，我是猜想。虚线，这边是一个伏笔。这是我最后一个幻灯片：“十之二与 12”。大家一看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史记》中司马迁记载，王子 20% 的税收要上缴国王，公侯 20% 的封邑收的钱要上缴王子。他列了一二十项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是十之二、十之二、十之二、twenty percent。他的结论是，任何行业不能够给我十之二的报酬不值得我做。从经济学的观点，这个代表会计利润 20%，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会计利润 20%。换句话说，经济利润为零的一般均衡，因为每一个都是 twenty percent，你不干这一行，干那一行，也只能赚 twenty percent。你的机会成本去掉以后，从会计利润（毛利润）里头，把机会成本（干别的行业能够赚的钱）去掉，真正利润为零。换句话说，所有的资源分配已经达到最有效了。不要忘了，《史记》比亚当·斯密早了两千年。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亚当·斯密可能读过中国书。因为在《国富论》里头写“譬如说中国古代利率为 12%”。12% 哪里来的？因为当初耶稣会他们把中国的重要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他们不太懂中国的文法，“十之二”翻译成了 12。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认为中国古代利率是 12%，这是个错误造成的。读过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跟 Francois Quesnay 重农学派的始祖，两个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Quesnay 是出名的中国迷（他的外号是“欧洲孔子”），所以亚当·斯密可能

間接地从那里得到了这个概念。我刚刚讲的，中国在唐朝女人就有 60 亩地，中国可是很先进的。我每次讲这个的时候，国内的学者，尤其是在教室门口的学生就围了一堆，有些人听完以后突然就把头抬得比较高了。民族自信心。

○司会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の熱のこもった基調講演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だと思います。特に私にとって印象的だったのは、初めて中国語で講演されるとのことでしたが、ここまで自然になされたという点に非常に感心しました。実は I C C S では、昨年まで 3 カ国語の同時通訳をしておりました。英語、日本語、中国語でしたが、昨今の金融危機があったりしましたので、経費の削減ということで、今年は日中の 2 カ国語でご報告いただくようお願いしたという経緯があります。

これから 30 分ほど、質疑応答の時間となります。とりわけ、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は非常に壮大な問題提起をされました。私がまとめるまでもありませんが、少なくともまず中国政府の経済成長、持続成長の可能性があ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この点については世界銀行副総裁である林毅夫 (Justin, Lin Yifu) 氏のご友人とのことですので、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も同じ観点に立っておられます。

それから、中国の発展モデル、これは経済に限らず社会も含めてですが、資源制約、格差問題などがある中での、これからの成長モデル、発展モデルの転換ということがもう 1 つの大きなポイント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中国とロシアの比較が一つの柱としてあり、これに対しては歴史の試練という考え方を導入されております。私にとっては、とりわけ経済史の、周の時代からこんにちまで、二千何百年のタイムスパンのなかでとらえ直す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刺激的な発言でした。

また政府の役割、企業化の推進、格差問題、食糧安保、それから場合によっては土地の所有権などは、明日からの各セッションのテーマとも関連しております。

質疑応答に入る前に、少し呼び水として、いくつか資料がありますので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林毅夫氏の話が出ました。林氏は先月、中国の経

済成長の可能性について話されました。結論から申し上げますと、中国は大丈夫でしょう、ということ。3つの理由を指摘されています。1つは膨大な外貨準備高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2つ目は資本に対してファイアウォールの役割を果たす管理と犠牲があります。これは 10 年前のアジア通貨危機のときと同じです。中国は金融の自由化をしていないので免れると、今回も自由化をしていないおかげで影響も小さいという発言でした。3つ目は、過去 4 年連続して黒字財政を実現した安定した財政政策をあげました。つまり、中央政府には資金があると。公共投資を増やすことで乗り切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ということが、林氏の基本的な意見です。

彼の話引用すれば、良好なファンダメンタルズがあるため、中国は内需を刺激することで経済発展を促すことができます。内需刺激では、農村への資金投入を増やし、産業高度化を実現し、教育、医療への支出を拡大することは可能であると、中国経済の将来性に自信を示されております。

一方、世界銀行中国事務所は、2週間前に反対の意見を発表しました。2009 年の中国の GDP の伸び率は、おそらく 7.5%程度にとどまる。6月に公表した値から 1.7 ポイントの下方修正をしました。中国政府は 8%の経済成長率を守りたいと主張しているのに対して、世界銀行は 7.5%と比較的厳しい見通しを示しました。

とりわけ輸出に関しては、2008 年の伸び率は 11%であろうとされていますが、2009 年には 3.5%で、-7.5%は落ち込むであろうという見通しも示されています。無論、林氏は世界銀行の副総裁であり、チーフエコノミストですから、同じ世界銀行の発言としては相反する意見になります。これは果たしてどう捉えればよいのでしょうか。皆様、多くのご意見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ジャック・ホウ先生に対してご質問があれば積極的に手を挙げていただいて討論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質問の際には、お名前と所属をお知らせください。では、どうぞ。

○会場 (一般) 田中忠仁と申します。大阪から来ました。京都外国語大学で中国経済を担当しております。昨年も加々美先生のお招きでまいりました。

私はジャック・ハウ先生のお話を聞いて、中国に対して愛情をお持ちであり、かつ今後もバラ色であるとお考えを示されたという印象を受けました。私もある意味では賛成なのですが、またある意味ではまったく反対の意見も持っています。いくつか理由があります。その1つは経済学史的に考えると縷々周の時代からたくさんのことを述べられました。確かに5000年の農業経済の歴史、またビジネスの歴史はありますが、残念ながら工業経済の歴史は新しいと思います。

日本の工業の歴史は明治革命以来少なくとも150年、江戸時代から考えるともっと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中国の場合は、毛沢東の時代よりさかのぼってもたかだか清朝末期です。もっと古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今の世界情勢から考えると、長年ビジネスをしてきた関係上、中国に対して非常に悲観的な思いを持たざるを得ません。中国を愛するあまり心配なのです。と申しますのは、例えば、「神の見えざる手」について、確かにアダム・スミス (Adam Smith) は、自動調整により需要と供給の関係がうまく調節され、結果として私利私欲の一般の民が良い方向に向かうと言いましたが、これはキリスト教的精神あつての、ベースに宗教があつてのことです。それで、私が疑問に思いますのは、中国に宗教があつたのかということ。黄帝 (Huangdi) 以来の、始皇帝以来の、孔子様以来の、しかし、批林批孔 (ひりんひこう) と、いろいろなことで中国は宗教を排除してきました。その点が心配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ジャック・ハウ 我基本上同意。刚才讨论的问题其实马克思·韦伯提过，马克思·韦伯当初说清教徒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阻碍，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马克思·韦伯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不够透彻，有一些结论是由于他观念的错误。我有一篇文章，放在那边很久，文章很长，八十多页，里边其实就在反驳韦伯的一些概念。讲工业化，我区分成两种，一种是 industrial capitalism，另外一种 commercial capitalism。中国最少有三次达到过商业化资本主义，汉朝初年、南宋、明朝，中国达到过三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达到大量工业化，生产是科技。我刚才讲过，从某一个观点来讲没错。可是中国有三次达到过商业资本主义。我刚才讲的

传输成本这一篇文章里面，其实是针对马克思的学说讲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下层基础，经济主导政治。这个基本上没有错。可是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念，认为卡尔·马克思讲的主要是小国，因为马克思看的欧洲国家再大的比中国都小。中国在汉朝的时候，其土地、人口就已经比现在的欧洲大了。小国的话，一个工会，如果组织够好、力量够大就可以主导政府的改革。可是中国从秦朝大一统以后，一个纯的经济组织，工会什么的不管他存不存在，就算他存在的话其影响力也不够。所以我在那里就借用诺贝尔奖得主加拿大的 Mundell 的理念，讨论相对斜率决定是一个稳定均衡还是非稳定均衡。我刚才在传输成本的 paper 里面做过讨论，政治体制的均衡线跟经济体制的均衡线交叉至两个体制的一个和谐均衡点。我也是利用这两个均衡线的相对斜率。我所要提出的就是说，小国他是一个不稳定均衡点，所以一旦有一个 shock 让他离开均衡点，他的制度会演化，而找一个新的均衡点。可是在一个大国他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有任何干预 disturbance，让他离开了均衡点，因为是稳定的他又恢复到原来的均衡点。中国历年来改朝换代，等到经济跟政治的体制冲突的时候，农民起义、粮食问题，等到解决了以后是不是又回到了原来的一个体制？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大国，他是一个稳定的均衡。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跟儒家思想不一定是直接有关的，因为中国很早就已经大一统。我觉得这是稳定均衡的一个问题。另外，刚才讲到我认为中国，从某一个观点来讲非常不幸，中国在清朝开始的时候，属于世界一级强国。可是不要忘记，雍正的时候开始封国，外商不准住中国。外国人必须得住在香港。早上坐船到广州做生意，晚上日落前得坐船回香港。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要香港，因为他们一直住在那里。那个时候封国有很多原因。当初雍正争王位的时候，教会支持的不是雍正，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很久以来基督教跟传统的中国敬拜祖先始终是相冲突的，经常会爆发暴动等等。雍正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彻底解决了，所以洋人才被赶出去。雍正锁国的时候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所以从一个时机来讲，是一个最不好的时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近一两百年，应该讲解放前，从19世纪开始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知道这个没有完全解答你的问题，只是从经济史的观点来判

断。

○司会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時間の制限がありますので、質問をあと2名、1分以内で受け付け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では、どうぞ。

○会場（ルー・ディン） 我是陆丁，想请教侯教授。有关中国最近有很大的财政扩张计划，这个效果现在看来有两个方面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一场金融风暴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完美的风暴，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经济转型非常好的时机，这个巨大的财政开支可以让中国从一个外向为主转成一个内需为主。但是反面的意见就认为，中国这一次大的财政扩张是把前几年辛辛苦苦改革积累的一些成果可能又要毁于一旦，现在一个是各省市的政府都跑进北京，就是跑“部”前进。“跑”就是跑到部里面去拿那个钱来前进，就叫跑“部”前进。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寻租活动。那么接下来这个巨大的寻租活动后果就是说他的财富不是富在民间而是富在官员，掀起一个更大的腐败浪潮。而且接下来这么一个巨大的财政开支里面，就是说“坏账”，这个银行好不容易把“坏账”给压下来，今后这几年恐怕……。您对这个危机的预测是比较乐观的，可能是一个V字形的复苏，如果这么大的钱砸下去以后，有一种说法是说，2010年中国会进入一个高通货膨胀、高腐败、高坏账的一个阶段。请您指教。

○司会 大きな質問ですから、これを最後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ジャック・ハウ 中国腐败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四川大地震也可以看到很多端倪。这个问题当然很大。经常一些朋友聚会他们就会问，“你认为……怎么样？”如果我知道的话，你以为我还会在大学里面教书吗？我早就买一个私人小岛退休了。我刚才讲我不是中国专家，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第一我不是在中国长大的，第二我每一年在国内时间很少，所以这个认识当然有限。但是腐败问题，我

十几年前其实就写过一篇文章，略带一点讽刺，但是也有事实存在。在中国经济改革，好像是91年前后，那个时候经济改革还算是相对比较早期的，我那时在讲，腐败、贪污其实也有他正面的效果，因为他更证实利润的存在，他有一个示范效果。转型这个问题。利用这个机会转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然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显示出政府的作用，在座的各位专家如果能够替政府提供意见，帮政府找一个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我退一步的讲，事实上在96年，我受台湾政府的邀请给他们提供意见做外贸进口的管理，我也是提出用外贸管理作为台湾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我现在不讲台湾，譬如说这次国内政府如果选择性的解救，对于那些策略性的企业（那些觉得是中国比较利益已经失去了）利用这个机会慢慢的淘汰，这个是可行的。我对于国内不是很了解，刚才提到，早上吃完早饭后跟前面这几位学者讨论政府有没有这个钱，这个钱砸完了是不是就没有钱了？政府的钱多的很，刚才提到中国政府有很多剩余，而美国政府是赤字累累，所以这个能力是存在的，至于有没有这个睿智利用这个作为转型，这个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我刚才也提到内需是中国的一个关键，中国太过于依赖对外贸易，就是刚才那位先生提到，中国过度依赖对外贸易，这个就是毅夫讲的那个Firewall，过度依赖贸易的话，你的Firewall不够好，如果要内需够强的话，Firewall才够强。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答的。两位先生有兴趣的话，结束以后私底下可以继续讨论。当然从我的观点来讲，去参加所有学术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人，听不同的意见。否则的话，如果都听我自己讲，那什么都学不到。谢谢各位。

○司会 ジャック・ハウ先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皆さん、盛大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では、これで質疑応答を終了いたします。